

江勇振，〈《日正當中·1917-1927》〉
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3。956頁。

馬 勇*

動筆寫這篇短文時，正值胡適誕辰 123 周年紀念日，大陸網路上出現了不少高度頌揚胡適的言論。短短幾十年，胡適在大陸知識界的地位滄海桑田，從「人民公敵」漸漸成爲「當代聖人」。幾位 1962 年出生的知識界朋友，試圖接續胡適思考、推進胡適畢生所期待的民主事業，被視爲或自視爲「1962 年學人」。¹但在臺、港、海外華人世界，胡適的身影漸行漸遠，其思想在已經民主化的地方，自然不再有市場而走進歷史，成爲嚴肅的研究。在如此不同的情境下，拜讀江勇振的新著《日正當中·1917-1927》，不禁讓人感慨良多。

《日正當中》是江勇振「胡適大傳」「舍我其誰：胡適」系列第二部。兩年前得讀第一部《璞玉成璧，1891-1917》，²就被作者構思宏大、史料豐富、考訂嚴密而折服。作者不囿成說，不全信胡適，更不全信之前的研究者。面對胡適研究的大家余英時、唐德剛、林毓生、耿雲志、周質平、羅志田等，作者在行文中毫無顧忌不時提出疑問，並給予更加詳密的論證。許多習以爲常的舊說、看法，均被作者解構、重讀。胡適的「面貌」，煥然一新。

*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

¹ 任劍濤、許章潤、陳志武等，〈胡適思想的當代考察——紀念胡適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〉，《戰略與管理》，2012 年第 6 期，<http://www.cssm.org.cn/view.php?id=32743>。（2014 年 12 月 16 日檢索）

² 江勇振，《璞玉成璧，1891-1917》〔舍我其誰：胡適（第一部）〕（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1）。

江勇振《璞玉成璧》描寫的時段，為胡適出生至 1917 年留學歸國的 26 年，筆者閱後當時就期待作者接著往下寫作；然考慮到《璞玉成璧》長達六十多萬字，估計即便動手也不會很快完成。出乎預料，僅兩年就得見《日正當中》。

《日正當中》長達千頁，極為厚重，接續第一部，全面解析胡適留學歸國至 1927 年的歷史。該書前言不長，稍有情緒，主要回應《璞玉成璧》出版後的不同議論，直率批評唐德剛、林毓生、耿雲志、羅志田、周質平等研究中的問題，以為幾位「所用的方法不外乎是就胡適來解胡適，用胡適自己的話作依據，而不是從杜威、赫胥黎、穆勒、易卜生等人的原作裡去追溯胡適思想的來源，不是把胡適放在他所處時代的思想脈絡下來分析，他們等於是墮入了『胡適說過就算主義』而不自知」（頁 2-3）。

《璞玉成璧》出版後，一個很重要的質疑是胡適全部留存文獻不過 2,000 萬字，而江勇振僅寫胡適青春期二十來年就用了 60 萬字。批評者說，假如江勇振照這樣寫胡適，全部下來不少於 600 萬字，那讀者不如直接「看胡適資料就好了」。對於這樣的批評作者格外惱火，以為批評者「根本就是不知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為何物」（頁 3）。

江勇振這兩部書一個最突出的貢獻，就是不再像過去的研究者基本以胡適一系列「自述」為線索建構敘述框架，而是像胡適教導的那樣，事事處處抱著懷疑的態度，通過對胡適作品的研讀、與相關史料的對讀，發現胡適「自述」中的問題。這些問題實事求是說，是對胡適研究的巨大推進，將來的胡適研究，沒有人可以無視江勇振的考訂。

然而對於江勇振處處質疑的做法，也有批評者不以為然，懷疑是因為「走火入魔」，「握著鐵錘」，所以「到處看到釘子」，「吹毛求疵，多臆斷，好抬槓」。批評者感慨，胡適的傳記若能站在前人肩膀上，把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加以整合，「已是傳世之作」。對這個批評江勇振反唇相譏，以為批評者只是「孔恩（Thomas Kuhn）的『典範』（paradigm）以前的思維方式」，不明白：「敲打釘子，等於是在那『舊』的典範裡作補苴罅漏的工作。試想：如果

不拿那大鐵錘來做摧枯拉朽的工作，何以能有另闢蹊徑、重起爐灶的可能？」（頁9）

在接下來的〈序幕〉中，作者充分發掘杜威等人中外文資料，試圖為後面分類敘述描繪一個大歷史背景，描述了那時的北京、中國人的飲食、胡適在北京的生活起居以及他的朋友圈。

〈序幕〉後為正文，作者以八章篇幅解讀胡適一生中最輝煌的10年，探究胡適何以從歸國留學生迅速成為「日正當中」的學術、政治新星。這10年是胡適畢生事業的起點、基礎，作者的細緻解讀揭開了許多歷史謎底。

第一章〈北大新星，造國之大學〉，主要討論北大的歷史、空間、秉持的大學理念、美國大學制度對北大的影響，旁及北大內部架構、教授待遇、學生狀況、學潮等；也就是胡適生存的小環境。

第二章〈杜威思想，赫胥黎懷疑〉，集中討論胡適與杜威、赫胥黎的思想關係。涉及杜威的，主要是胡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杜威的思想，他與杜威的思想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。按照作者的看法，胡適標榜自己實驗主義思想來自杜威，其真實性令人生疑。在赫胥黎部分，作者的關切依然是胡適自述的真實性，胡適的名言「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」，在江勇振看來，「胡適只說了冰山的一角。胡適沒有告訴我們的是：赫胥黎這『層層累積』的理論、赫胥黎對《聖經》裡的傳說的摧枯拉朽的工作，就是胡適自己後來的『疑古』的研究，就是胡適後來的禪宗研究的靈感與方法論的來源」（頁225）。江勇振這個指控不僅涉及誠實，而且關涉胡適學術成就的重估，相信一定會引起胡適研究者的討論。

1917至1927年的10年，是胡適成就最大、地位上升最快的10年。期間胡適的主要貢獻就是積極介入新文化運動，並在一般公共政治議題上發聲。第三章〈過關斬將，爭文化霸權〉通過一系列案例詳述胡適的貢獻，如「用入學試題宣揚新文化」，在過去的胡適研究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。至於文言白話之爭、《新青年》的雙簧、問題與主義之爭、科學與人生觀論戰，雖說是胡

適研究中的常規課題，但江勇振的研究均新意迭見，論證嚴密。

胡適成名在新文化，但其終身不渝的興趣則在政治。胡適回國後確曾發誓 20 年不談政治，決心為中國政治打下一個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礎，但後來，胡適還是「忍不住地關愛」談政治。第四章〈個人社會，政治與國家〉集中討論胡適這個時段的政論，以及不由自主所介入的一些實際運動。這些主題，雖說都是胡適研究繞不開的題目，論者不知凡幾，但江勇振的討論，依然能夠依據新發現的材料，提出自己與眾不同的看法。

與政治主題相關的討論還見於第八章〈帝國主義，東西方文化〉，討論胡適為什麼否認帝國主義的存在，中國為什麼可以「後來居上」（頁 823）。對於美、蘇兩國的態度，那時中國知識人無法回避，先前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胡適對美、蘇看法的不同，但究竟應該怎樣評估則見仁見智。江勇振對已有研究不太認同，強調胡適不是一度激進傾向於俄國，「事實上，胡適對美國從來就沒變節過。他對蘇聯的態度，也始終是用美國那把尺來衡量的」（頁 831）。胡適否認帝國主義的存在，但又不否認那時日趨高漲的民族主義，甚至期待對這些民族主義運動有引導、矯正的作用。

與民族主義相似的還有「革命」。革命，也是胡適並不常用的詞彙，但 1920 年代的中國，畢竟是政黨衝突最激烈的時候，革命不可避免更沒有辦法「告別」。胡適對革命究竟取什麼樣的態度，在許多讀者心中似乎久已定型：胡適是政治上的改良主義者，信奉一點一滴的改良，不可能認同革命，更不可能支持革命。而江勇振的研究結論恰恰相反，「大家都愛說溫和的胡適，其實他也有很少人知道的『以殺止殺』、『以暴治暴』的一面」（頁 904）。

另外加上〈事功第一，行樂要及時〉、〈哲學佛教，歷史與文化〉、〈信達兼顧，翻譯大不易〉各章，可略知全書梗概；拜讀江勇振的《日正當中》，獲益良多，作者像胡適所期待的那樣，做學問於不疑處有疑，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，廣徵博引，用充分史料論證自己的發現。應該承認作者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，這部胡適研究系列，是未來胡適研究者無法避開的基礎，不論在問

題設置上還是論證細節上，江勇振都做出了創造性貢獻。

如果要說有哪些還可以商榷，在我的閱讀中，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假如胡適還活著，他會怎樣評價江勇振的這些研究？

胡適是一個重證據的人，也是一個願意說理的人，他對江勇振提供的證據應該不會質疑，比如胡適 1959 年回憶 23 年前在哈佛的演講，不僅與當年回到國內發表的感想有異，而且與哈佛官方檔案出入不小。對於這樣的「硬傷」，相信胡適一定會欣然接納、萬分感謝（頁 37）。

對於有些問題，比如胡適 1922 年底獲選「今日中國的十二大人物」（頁 308），江勇振提供的證據是可信的，但在「平和的」描述中，總讓讀者有一種陰謀論的感覺，總覺得陽光如胡適的人，也有陰暗的一面、也在用手腕，而目標只是為了「爭文化霸權」。這對許多熱愛胡適的讀者來說，未免顯得太殘忍。

江勇振對大陸最近幾十年的胡適研究有直率批評，以為崇拜胡適的人，將胡適視為「中國現代化的先知」，「則把歷史與未來混淆了」。胡適的思想基調，「是維多利亞後期的思維。如果 21 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話，那未來的中國就要回到 19、20 世紀之交。這是科幻小說裡的時光隧道思古的幽情，不屬於嚴肅思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範疇」（頁 11）。

胡適思想確實具有時代性，未來的中國並不一定會沿著胡適所給的出路徑自往前走；但作為一種思想資源，胡適以及那一大批 1949 年前的自由主義者，即便不是「中國現代化的先知」，也是「中國現代化的先驅」，對他們的思想心存敬意，可能還是當前大陸思想界的一個方向。